

论《尤利西斯》中的莎士比亚*

申富英**

内容提要:詹姆斯·乔伊斯的代表作《尤利西斯》中有整整一章专门讨论莎士比亚的生平与创作,似乎与整部小说格格不入,但如果我们将这一章放入作为爱尔兰的“民族寓言”的《尤利西斯》的文本框架之中来研究,可以发现莎翁的生平与创作这一部分是乔伊斯关于艺术与民族问题的方方面面观点的类比。莎翁本人乃是爱尔兰上下求索的艺术家的类比,莎翁与其父亲、兄弟之间的关系分别类比起爱尔兰与其传统文化、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莎翁与其妻子的关系乃是乔伊斯本人与处于殖民统治下的爱尔兰之间关系的类比。

关键词:《尤利西斯》; 莎士比亚; 艺术; 民族; 类比

Abstract: In *Ulysses*, the masterpiece of James Joyce, there is one whole episode which discusses Shakespeare's life and artistic creation and thus seems to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the whole novel. But if we put this episode into the framework of the whole novel which is regarded as a national allegory of Ireland, it can be found that Shakespeare's life and artistic creation are the analogies of Joyce's ideas of art and national issues; Shakespeare himself is the analogy of the artists who are searching for tru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hakespeare and his father and that between him and his brother are respectively

* [基金项目]: 本文系作者主持的山东大学自主创新项目“《尤利西斯》显性文本与隐性文本类比关系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批准号:IFW09009。

** [作者简介]: 申富英,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导、博士,主要从事英美文学方向的研究。

analogie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rish culture and the tradition and that between Irish culture and nationalist cultu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hakespeare and his wife is the analog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Joyce and his motherland under the colonialist oppression.

Key words: *Ulysses*; Shakespeare; art; nation; analogy

一提到乔伊斯(James Joyce, 1882—1941)的《尤利西斯》(*Ulysses*, 1922)中的典故,人们往往马上会想到荷马史诗《奥德赛》(*Odyssey*),少有人会想到它与莎士比亚有什么联系。实际上,《尤利西斯》在某些章节上既有与莎士比亚的代表作《哈姆雷特》(*Hamlet*)在人物形象上的对应关系,又有对莎士比亚生平与创作的直接论述,仅直接论述莎士比亚的内容就在这部 18 章的小说中占了整整一章。但《尤利西斯》为什么专门辟出一个章节来讨论莎士比亚的生平和创作这个问题往往使普通读者莫名其妙,也令很多批评家大伤脑筋,因为这一章似乎与《尤利西斯》整个文本并没有太大的联系。

但如果我们接受目前许多批评家的观点,将《尤利西斯》看做是爱尔兰的“民族寓言”(Jameson 68),看做是关于书写爱尔兰民族和文化的史诗,(Gilbert 1963: 180)那么只要我们对文本详加研读就不难发现,《尤利西斯》中的莎士比亚乃是爱尔兰为艺术上下求索的艺术家的类比,莎士比亚与其父亲、兄弟及妻子之间的关系分别类比着爱尔兰与其传统文化、民族主义文化和异族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乔伊斯借莎士比亚为类比源,传达出他本人对爱尔兰民族文化的定位以及他对传统文化、殖民文化和民族主义文化之间关系的看法。

一、莎士比亚:超越现实困境的艺术家的类比

正如斯蒂芬在《尤利西斯》中所认识到的那样,莎翁的生命本身便是困难和罪恶的海洋。但莎翁将所有的困难和罪恶通过艺术转化

成了美,将自己的错误转化成了“认识之门”,这是斯蒂芬眼中艺术家最理想的状态。他抛弃了妻子,但此举却为他赢得了全世界的青睐。他儿子哈姆奈特的死,刺激他创作出永恒的“儿子”形象“哈姆雷特”,而他妻子与莎翁兄长的私通令他创作出了《哈姆雷特》中的王后“格特鲁德”和弑君者“克劳蒂斯”。他对兄弟又爱又恨的情感使他在戏剧中创作出各种各样的兄弟形象:“撒谎的弟兄、篡位的弟兄、通奸的弟兄,或者三者兼而有之的弟兄”(Joyce 1986: 174)。他强烈的金钱欲使他创造出《威尼斯商人》(*Merchant of Venice*)中永恒的经典形象“夏洛克”。他所犯的罪恶,包括原罪,“在他所创造的世界各个角落,都变幻无穷地存在着。”(Joyce 1986: 174)

莎翁化腐朽为神奇的能力的秘密在于他能超越实体世界和个人的狭隘思想。他有能力同时做到“是鬼魂,是国王,又不是国王”(Joyce 1986: 155)。他既是“凌辱者”,又是“被凌辱者”(Joyce 1986: 162),并有能力“让失对他来说就是得,他就带着丝毫不曾减弱的人性步入永恒”。他“一天天地编织再拆散他的身子”,让“肉体的分子来来回回穿梭”,“把自己的人物形象编织起来再拆散”(Joyce 1986: 155)。他是鬼魂和王子,能合二为一。他超脱出个人的情感与仇恨,奋力抵抗所有人类的困境,超越所有的琐碎与个性,成为“每一个人”,这是斯蒂芬眼中理想的艺术。就像休·肯纳(Hugh Kenner)所说,莎翁“摈弃了家系的枷锁,在他自己所创造的更为真实的世界中获得自由”(Kenner 114)。他抛弃琐事和实体,获得超越琐碎的真理,达到了永恒。

在主人公斯蒂芬的哲学思想里,所有关于莎士比亚的观点似乎与斯蒂芬对爱尔兰的想法并无多大关联。但如果读者们仔细读完第九章,便能觉察出莎士比亚和斯蒂芬(或乔伊斯)间的相似之处。在这个章节里,“斯蒂芬也是无意识间发挥出爱尔兰传统赋予文学大师的预言力,这个预言既是对埃文河(英国)也是对伊林(爱尔兰)的”(Gilbert 1952: 213)。正如莎士比亚所展示的,一个伟大的文学家,若想不朽,就必须合众为一,融合所有人的特点,必须成为“每一个

人”。就斯蒂芬和乔伊斯所处的形势而言,一个伟大的文学家就必须跨越民族间的隔阂。斯蒂芬决心远离撒克逊文化集中营,远离莎翁(哈姆雷特)的“血腥的屠杀场”,避免不小心成为克兰利的一名沉默寡言的传令兵,“离得远远地观望着战斗”(Joyce 1986: 154),这都表明了他决心追随莎翁,超脱具体繁琐的事务,并跳出民族主义的偏见。德里克·阿特里治(Derek Attridge)和玛乔里·豪斯(Marjorie Howes)的论断明确地表达出了乔伊斯超脱民族偏见的倾向性:“从哲学角度上看,可以说他既是一个分裂主义者,也是一个统一论者,始终用对立统一的视角来考虑着问题……乔伊斯写的关于爱尔兰的文章做了同样的质疑,既强烈支持又高度批判了爱尔兰的民族主义。”(Attridge & Howes 2)

二、莎士比亚的父子关系：文学创新 与传统文化之间关系的类比

就历史传统而言,“父与子”是《尤利西斯》中的主题之一。这种父子主题不能仅从字面上理解,因为斯蒂芬在西蒙·达德勒或是布卢姆身上寻求的“并不是一个父亲,而是一种父性特质”(Murphy 51)。在《乔伊斯的〈尤利西斯〉》(*James Joyce's Ulysses*, 1952)一书中,斯图亚特·吉尔伯特早就提出,《尤利西斯》里的父与子主题应该理解为过去与未来两代人之间的联系。(Gilbert 1952: 214, 344)如果“继承者”(儿子)可以认定为是过去与未来的连接,那么“父亲”便代表着过去、传统、历史和文化根源。因此,父与子的主题可以解释成乔伊斯和斯蒂芬对文化传统和文学创新的思索。

斯蒂芬运用了莎士比亚的生活与创作中的父子关系问题,用类比的手法来探究文学传统和原创性之间的关系。若不能为创作提供有价值的素材,文学传统便是垃圾;而在文学创作过程中,如果没有从传统中汲取任何精华,那也算不上创作。“倘若没有儿子的父亲就不成其为父亲,那么没有父亲的儿子真能成为儿子吗?”(Joyce

1986: 171) 斯蒂芬的回答自然是否定的,因为父亲与儿子的身份的确立取决于对方的存在,正如传统与创新相互依存一样。父与子,或传统与创新,对立统一地相互转化着:“他不仅是自己的儿子之父,而且还由于他不再是儿子了,他就成为,自己也感到成为整个家庭之父——他自己的祖父之父,他那未出世的孙儿之父。”(Joyce 1986: 171)

创新是对传统的接受,而传统也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创新。一位伟大的艺术家必须有能力在传统中创新,例如,将历史神话运用于创作中或者借他的祖先说出一些原创的和现代的东西。“他是一个鬼魂,也是一个王子”(Joyce 1986: 174),也就是说,一个艺术家必须创造出一种综合传统和创新的文学,并且把它们融成和谐的整体,一种“超越一切的一切”。

把传统和原创融合为一体,这并不是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传统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伟大文学家创造性思维的巨大负担,正如父子间永远存在着的矛盾。“儿子未出世前便损害了美。出世之后,带来痛苦,分散爱情,增添操劳。他是个新的男性:他的成长乃是他父亲的衰老;他的青春乃是他父亲的妒忌;他的朋友乃是他父亲的仇敌。”(Joyce 1986: 170) 这种观点与形式主义的文学陌生化的观点有不少相似之处,因为形式主义一直强调作家们把他们与先人的创作或经典作品区分开的意义。一个作家对历史遗产心怀感激并不是一件愉快的事,因为创作本身就意味着与传统痛苦地搏斗,正如斯蒂芬所想到的某些强加于父子间的情感:“父性可能是法律上的假定。谁是那位受儿子的爱戴,或是疼爱儿子的伟人之父呢?”(Joyce 1986: 170) 在类比意义上显而易见的是,那些后辈作家的创作,如果具有伟大的艺术性和社会意义的话,必定突破或背离前人的经典。

三、莎士比亚的兄弟关系：乔伊斯 与同时代作家和民族主义者之间关系的类比

除了传统与创新之间的关系,另一个折磨斯蒂芬或乔伊斯艺术思想的问题便是他的作品与同时代的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每一件伟大的艺术作品都是同时代作品间不断磨合的结果。这种关系在类比层面体现在莎士比亚兄弟间的关系中。在第九章里,“兄弟”作为另一个重要的主题,类比性地说明了同时代文学创作之间对立统一的关系。实际上,莎士比亚所有的梦想都夹杂着他对兄弟的爱与恨。莎士比亚毫无疑问珍惜着自己的兄弟情谊,但是他对妻子与兄弟有染的怀疑却不断侵蚀着这份兄弟之爱。他对兄弟们的怨恨经常表现在他的戏剧里。“他笔下的那帮恶棍扒手——黑心肠的三位一体:伊阿古、罗锅儿理查和《李尔王》中的爱德蒙,其中两个的名字都跟他们那坏蛋叔叔一样。”(Joyce 1986: 172)他与兄弟间的矛盾似乎不可调和,甚至连时间和死亡都不能使之消减。

把同时代的作家对莎士比亚的严厉批驳和斯蒂芬的强烈反对和同时期的民族主义作家并行来看,斯蒂芬强调莎翁对兄弟不可思议的憎恨便不难理解了。很明显,斯蒂芬将莎士比亚对兄弟的憎恨类比为他自己对其同胞,也包括他自己的兄弟的憎恨。他将自己的兄弟当作了磨刀石。他的恨并不局限于他在血缘上的兄弟,而是波及了他的同胞,包括民族主义的领袖克兰利、爱尔兰寻欢作乐的背叛者和英国走狗的类比人物穆利根。斯蒂芬把他们当成了磨刀石,一些能激发他的灵感、挑战他耐心的刺激物。那些狭隘的民族主义者和那些整天快乐地沉迷于酒精、赌博和调情的背叛者们都给斯蒂芬和乔伊斯的创作思想以令人窒息的压力,同时也给他们以巨大的动力。

当然,乔伊斯或斯蒂芬对民族主义的憎恨并不意味着乔伊斯是英国文化帝国主义的辩护人。正如亚当·吴德拉夫(Adam Woodruff)所说,“乔伊斯当然不可能是英国文化帝国主义的辩护人。”(Woodruff 83)乔伊斯假装的对争取民族独立主权的漠不关心、表

面上对爱尔兰文艺复兴刻意保持的距离和他作品中那虚构的冷漠人物,并不能让批评家忽略这样一个事实:乔伊斯始终都“保持着对文艺复兴的基本概念的忠诚”(Deane 172)。用乔伊斯自己的话说,如果不是因为爱尔兰人对爱尔兰语言(盖尔语)的坚持和葛里菲斯正在报纸上“用旧的种族怨恨教育爱尔兰人民”的话,他可能已成为一个民族主义者。(Ellmann 187)

四、莎士比亚的夫妻关系：乔伊斯 对祖国复杂情感的类比

对莎士比亚文学创作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他对妻子复杂的爱,以及他与妻子间的相互背叛。还用我们分析莎翁与父亲、儿子和兄弟之间的关系的逻辑,我们可以发现《尤利西斯》中的另一个类比,即用莎翁对家庭成员的感情类比斯蒂芬对祖国的感情以及他和历史的关系。用莎翁对妻子的爱来类比斯蒂芬对祖国的爱恋,我们便很容易理解斯蒂芬对国家那复杂甚至是令人费解的情感。莎翁对妻子的爱,一半是自愿的,一半却是旁人强加的,正如斯蒂芬深入剖析的那样:莎士比亚并没有选错,因为他是被他的妻子选中的。他的妻子狡猾地勾引了他,但没有人能否认他对妻子的爱恋,因为安妮在勾引他的时候,是如此的迷人。

莎士比亚对妻子这种半推半就的爱与乔伊斯或斯蒂芬对祖国的爱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等的。尽管斯蒂芬承认,他不过是民族主义者克兰利“沉默寡言的传令兵”,但他“不会拥抱爱尔兰,不会狂热地热爱他的祖国,因为她是令人厌恶的”(Murphy 56)。在莎翁的一生和他的作品中,对背叛和通奸的憎恶最深。离开故乡后,莎翁便陷入了与多名女子甚至是与一些英俊男子们的难以启齿的爱恋之中,而他的妻子依然处于通奸的丑闻中(仍保持着与莎士比亚兄弟的不正当关系)。这种憎恨和负罪感与斯蒂芬当时的心境极为相似,那时他已决心背离爱尔兰民族主义所谓的纯粹的爱尔兰民族文化,并开始接

触国外的文化。他认为爱尔兰的文化已遭到数国入侵者的凌辱,这些凌辱者既包括入侵的英国文化也有令人窒息的爱尔兰天主教义。“他认为:这样的结合(与爱尔兰民族主义文化)对于任何艺术都是无用的。因此,他不再理睬她;他会把文学先辈遗留的与之相称的遗产随身携带”(Murphy 56)。与他所有和爱尔兰相关的记忆一起,“他按自己的意愿使用艺术的工具,把它们变成了为他,而非为她(爱尔兰),带来荣誉的文学作品。”(Murphy 56)

斯蒂芬对莎士比亚那不忠的妻子以及莎翁对妻子的背叛的思考象征性地表达了斯蒂芬自己对爱尔兰的复杂情感。斯蒂芬在潜意识里将自己与莎士比亚等同起来,而把爱尔兰类比成了莎翁的妻子安妮·海瑟薇。莎士比亚对他妻子的爱与恨极好地类比了斯蒂芬对处于英国殖民统治下的爱尔兰的爱与恨,而莎翁对妻子的负罪感则表现在斯蒂芬的自我选择上:他选择当一名流亡者,拒绝投身于民族主义的运动中,但他因自己远离祖国而深感内疚,虽然这种远离是一种冷漠的爱的必然结果,虽然他的心一刻也未曾远离爱尔兰。莎士比亚对背叛自己与兄弟私通的妻子的怨恨就类似于斯蒂芬对民族主义论者对爱尔兰的钳制的厌恶,而莎翁对其他男人与自己妻子不正当关系的厌恶正好表达了斯蒂芬对英国在爱尔兰实行的殖民统治的厌恶。莎士比亚坚定地离开妻子则类比了斯蒂芬远离他不再信仰的东西的决心,无论是民族主义还是爱尔兰的天主教教义。

通过对莎士比亚的思索,斯蒂芬理清了摆在他面前的困难,即殖民主义、民族主义和被二者歪曲变形的民族传统文化,也找到了如何通过艺术实现永恒的答案,明白了该如何处理历史、文学遗产、民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等问题。他决心在文学与现实、传统与创新、民族主义和殖民主义间保持平衡,通过走既不是简单合作又不是直接对抗的文化融合之路,在他心灵的铁匠铺内锻造出他的民族“未被锻造出的良知”(Joyce 1992: 196)。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 Attridge, Derek and Marjorie Howes. eds. *Semicolonial Joyce*. Cambridge: Cambridge UP, 2000.
- Deane, Seamus. "Joyce and Nationalism." *James Joyce: New Perspectives*. Ed. Colin MacCabe. Bloomington: Indiana UP, 1982. 168-183.
- Ellmann, Richard. ed. *Letters of James Joyce*. Vol. II. New York: Viking, 1966.
- Gilbert, Stuart, ed. *Letter of James Joyce*. Vol. I. New York: Viking Press, 1963.
- . *James Joyce's Ulysses*. New York: Vintage, 1952.
- Jameson, Frederic. "Third World Literature in the Era of Multinational Capitalism." *Social Text* 15 (Autumn 1986): 65-88.
- Joyce, James. *A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 Hertfordshire: Wordsworth, 1992.
- . *Ulysses*.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Ltd., 1986.
- Kenner, Hugh. *Ulysses*. London & Boston: G. Allen & Unwin, 1980.
- Murphy, Michael. "'Proteus' and Prose: Paternity or Workmanship?" *Ulysses*. Ed. Rainer Emig.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4. 49-60.
- Woodruff, Adam. "Nobody at Home: 'Cyclops'." *Ulysses*. Ed. Rainer Emig.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4. 81-91.